

(美) 理安·艾斯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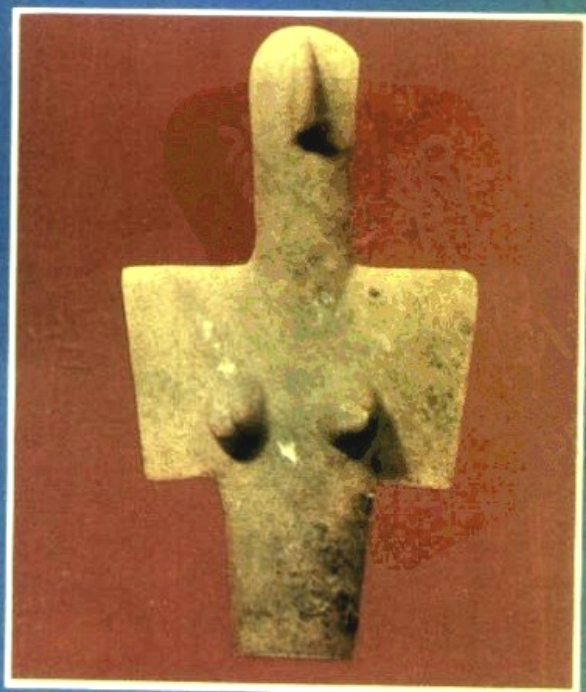
圣杯与剑

——男女之间的战争

THE CHALICE & THE BLADE

“自达尔文《物种起源》
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

——A·蒙塔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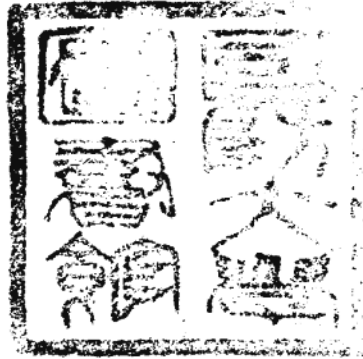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3 7643 8

圣杯与剑

——“男女之间的战争”

[美] 理安·艾斯勒 著

程志民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DF
PDF
PDF

Riane Eisler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8.

本书根据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 1988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5—510号

60724/16

圣杯与剑

——“男女之间的战争”

[美]理安·艾斯勒 著

程志民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翌新工商印制公司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1.875印张 300千字

印数 2001—7000

1995年11月第二版

1997年4月第三次印刷

ISBN 7-80050-334-8/G·58

定价:18.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前言

长期以来，我和许多西方人士一样，非常喜爱中国文化。我读过许多强调东西文化差别的著作。但是，15年来，我在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东西方文化之间不仅有差别，而且还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这里所说的相似之处，不仅指世界各地无论男女都有许多共同的需要、问题、希望和理想，而且我所指的是某种更本质的东西。因为事实证明，东西方可能有着相似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可能有相似的史前史。当时，在古代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里，东西方都有过一种没有暴力、更富于人道精神的、生态上更平衡的社会组织形式。

本书主要讲的是西方文明的史前史。它深入地研究了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称之为给考古学带来了名符其实的革命的那些出土文物，因此阐明了关于西方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流行信念。但是，《圣杯与剑》不仅对我们的过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一次带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我认为，我们的未来要向一种伙伴关系的，而不是继续向一种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发展。

本书前几章所讨论的那些考古学发现，给早期西方文明太平盛世的传说，即战争和“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出现之前的时代，赋予了一种新的、更为具体的意义。回顾我所读过的有关中国神话和考古学方面的著作，我同样坚信，在亚洲的史前时代，很可能也有过类似西方的发展过程。

在本书中我所阐明的史实证明，西方史前新石器（或第一个农业）社会是非常和平的。但是，也有迹象表明，早期中国农业社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例如，举世闻名的位于西安东边的半坡村遗址，考古学家把它描绘成一个和平的社会，也是一个妇女并不受男人奴役的社会。

我们还知道，在西方新石器时代的数千年历史中，人们所敬奉的是伟大女神。在有史时代的神祇中，例如，希腊的盖娅和罗马的伟大母亲，以及甚至在众所周知的现代术语——自然之母中，人们仍然保存着对于伟大女神的敬奉。在中国文化中，对于女神的崇拜也是源远流长的。在有些地方，甚至直到今天，观音和妈祖仍被供奉为赐给人类生命的慈悲女神。

上述这些事实证明，在一些男人以暴力手段迫使妇女和其他男人就范被视为是“正常情况”之前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某些众所周知的中国道教著作进一步证实了这点。正如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这些道教著作向封建等级制度（包括男人统治妇女这种现象）的基础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老子的著作，强调了对阴阳平衡的基本需要，就是说，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

很难准确地推测是否有其他史前资料足以证明，在“古代中国”（与加州大学考古学家马丽娅·吉姆巴塔斯所说的“古代欧洲”相对应）也可能有过一个伙伴关系的时代。我同样怀疑，即使有这种资料，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女性特征”在许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特征体现在很强的审美敏感性，以及对社会、亲缘关系和孝顺的极端重视。根据西方文化传统，这些都是“女性特征”的体现。

当然，在这篇简短的前言中，不可能以本书所提出的作为研究工具的伙伴和统治关系的两种社会模式对东西文化进化中的这些表面的相似之处，进行任何更深入的探讨。但是，我认为，在

中国历史上不时出现中国早期固有的伙伴关系传统和后来发展的统治模式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也许中国早期传统是伙伴关系的，后来逐渐融入了另一种社会模式，结果形成了在西方经常所说的亚洲文化的“矛盾”。

当然，这只不过是推测，如果想要予以证明，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但是，恐怕只有中国的学者——考古学家、民俗学家、宗教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和妇女史学者——才能真正做到这点。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本书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也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西方文化的新观点。

许多人认为《圣杯与剑》很有价值，因为它使人们看到西方文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本书问世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出现了许多反映本书所提出的新观念的书籍、艺术品，甚至歌剧和电视节目。本书除译成中文外，还有日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等10种语言的译本。更重要的是，本书也有助于各界妇女和男人，不只为我们这一代人，也为今后的世世代代，进行新的有意义的选择。

本书所肯定的是许多人已经了解的事情，但也是那些竭力维护统治地位的人（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所企图否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类是有选择自由的，而且可供我们选择的一条道路是：实现一种更加和谐、更加和睦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女性”价值以及妇女在我们的精神和社会结构中不再被贬为低人一等。

本书一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并不是要让妇女反对男人，或是让男人反对妇女，而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组织。因为很明显，男人和女人都能有“女性”行为，例如，非暴力、关心别人的同情感，或者有“男性”行为，如暴力和战争。

此外，我们所说的伙伴形式的社会组织，并不是一种完全无组织的社会，或是一种完全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权力并不是用来统治别人的社会，是一种等级差

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一种并不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包括打骂妻子儿女或进行战争）来强行贯彻等级制的社会。

换言之，主要适应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社会，和主要适应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社会，对于权力的看法截然不同。在统治关系的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以剑作为标志，即，以统治、杀戮和毁灭的权力为标志；而在伙伴关系的社会中，支配社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前者的权力。这种权力从亘古以来就是以圣杯为标志的，它的特征是给予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是以权力促进别人的发展，而不是以权力压迫别人。

总之，本书所阐述的问题不仅和妇女有关，而且和男人有关，尤其和全人类为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所作的共同努力休戚相关。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是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是靠空话，才深刻认识到，男人和女人、大国和小国、大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最后，我们同样也必然会认识到，只有通过加强东西方文化中的伙伴关系的传统，才能在这个日益受到核灾难或生态灾难威胁的世界里稳步发展这种相当重要的联系。

我希望本书的主张会在中国引起共鸣，就象在西方一样，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社会的发展，探索新的发展途径。我将此书的中文版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和西方人士一道，将这个因为高科技的滥用而受到威胁的世界，引上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稳定、更和谐、更具伙伴精神的航程。

理安·艾斯勒

1991年5月

译者的话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一书的作者理安·艾斯勒是一位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也是国际知名的文化史家、未来学家和女权主义学者。

艾斯勒女士生于维也纳，6岁时她的一家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乘船逃往古巴，在哈瓦那的一个小小的公寓中渡过了童年。14岁时移民到美国。后来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并在该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艾斯勒一直从事研究、写作、教学和社团组织工作。她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洛杉矶圣心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而且是进化研究小组的成员。她是妇女儿童人权立法的先驱，创建了一些重要的组织，包括洛杉矶妇女中心法律组织（该组织是美国同类组织的前驱）以及伙伴关系研究中心。她较早期的著作，包括《解体》（1977年）和《男女平等人权手册》（1978年），均饮誉全球，受到广泛的好评。她的文章曾刊登在很多重要刊物上，包括《世界和平百科全书》、《行为科学》、《未来学》、《政治心理学》等。艾斯勒很有口才，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她曾在各大学，如洛杉矶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各大公司，如杜邦、迪斯尼和许多世界性会议上，发表讲演。

艾斯勒是第一位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整体论的观点进行研究的学者。她对社会和科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她常被誉为现代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艾斯勒的《圣杯与剑》一书自1987年出版以来，受到广泛的

好评。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认为本书是“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著作”。《洛杉矶周报》称之为“我们时代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旧金山新闻》认为该书是一幅关于我们的“美好的未来的蓝图”。社会活动家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称之为“我们生存的一把钥匙”。

该书自出版以来在美国已再版 15 次之多，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出版，包括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腊文、芬兰文和葡萄牙文。许多大学把该书作为教科书使用。它对哲学、社会学、西方历史、经济学、政治学、文学艺术、人类学、文化学、考古学，以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伙伴关系研究中心，甚至被治疗学家作为治疗疾病的催化剂，广泛向病人推荐以加速其康复。

《圣杯与剑》一书首先提出了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为什么全世界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剥削？为什么人类这么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我们为什么这么野蛮而不是仁慈，为什么这么好战而不爱好和平，为什么要破坏而不是建设？有人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样的前提：人类互相之间是死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天生的，男女之间的生物学差别注定了妇女的屈从地位。艾斯勒认为，这些前提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并不是天生互相仇恨和压迫的，妇女并不是天生低于男人的，致命的竞争并不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圣杯与剑》一书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根据，并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可能的美好的未来。

艾斯勒指出，15000年前的人类历史证明，那时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中，那时妇女并不是一个受压迫的等级，社会也没有富人高高在上，穷人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只有竞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观念相反，艾斯勒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6000 年）没有竞争的社会发展了所有现代的基本工具和技术，例如，农业、冶金业、建筑业、城市规划、文

字、纺织和卫生设施。那时的人们并不敬奉残忍的上帝，而是崇拜伟大的女神，她象征着生殖、生命、丰裕和大地的繁荣。

艾斯勒借助于许多考古学家的著作详尽地追溯了西方史前文明的进化。她的叙述也许并不完美，但是，她指出，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野蛮人的入侵浪潮连续不断地横扫了欧洲和地中海周围的中东地区，毁灭了青铜时代高度发展的文明，包括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古代世界已经完全面目皆非了。奴役、战争、男性的暴力统治、恐怖的宗教和为了毁灭的目的而使用的技术，取代了从前和谐的、崇拜女神的、高度发展的文化。

通过上述论述，艾斯勒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因为几千年以前，社会是沿着伙伴关系的路线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联系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剥削和压迫的等级关系。妇女作为生命的给予者和女祭司受到普遍尊敬，而这并不是说当时是性平等主义的。但是，来自文明世界边缘地区的蛮族——库尔干人带来了靠暴力和暴力恐吓维持的等级制度统治的社会组织模式。这一过程继续了几千年，最后终于建立了强有力的男性统治。艾斯勒称这一过程是“5000年的统治者弯路”。这一弯路完全改变了我们文化进化的方向，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还受其制约。

艾斯勒认为，这两种社会组织模式并不是铁板一块。伙伴关系的社会并不是无组织的、无领导的社会；统治关系的社会也并不是绝对金字塔统治等级的社会。人类历史过程是由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模式之间的紧张斗争形成的。在某些历史时期，例如，大约在耶稣和文艺复兴时期，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倾向处于上升时期；在另一些历史时期，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倾向占据统治地位，例如，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中。

但是，这里自然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放弃它的史前伊甸园生活而陷入蛮族入侵者的手中呢？其次，现

代社会能够按照伙伴关系的模式重新组织起来吗？

为了回答这两个有关文化转化理论的问题，艾斯勒借用了目前流行的系统论和一般进化论的概念构架。她用这些概念解释了社会这种大系统从伙伴关系的模式向统治关系的模式的转化。与强调现状的、线性的和静态的模式旧科学相比，新理论假设系统是自由组织的、互相联系的、互相增强的和互相复制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系统可能被打乱，以致于系统的行为变得无法预测出来。偶然性日益增加，直到系统达到科学家所谓的“基本分叉点”，在这个分叉点上，系统本身转化成某种完全不同的系统。

艾斯勒认为，几千年以前，人类社会从伙伴关系的社會转化为统治关系的社會，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这种基本分叉点。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分界点的边缘。我们或者毁灭我们自己，或者改变我们的观念。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观念，但是，只有更多的人，或者说，全人类都改变他们的观念，人类社会重新向伙伴关系的社會模式的大规模转化才是可能的。艾斯勒坚信，这种转化是可能的，因为它以前曾经发生过。人类社会将来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伙伴关系的新社會，当然，这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

最后，艾斯勒阐述伙伴关系的新社會的三个主题：和平、伙伴关系和创造性。她指出，在这三个主题中，创造性是最重要的。这种创造性并不是单纯的发明，而是文艺复兴和印象主义的艺术家的那种创造性，他们根据他们的天性、快感、他们所使用的色彩以及和大自然的直接联系所发挥出来的那种创造性。

艾斯勒认为，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需要更多的人去探索、去研究，才有可能找到切实可行的答案。

《圣杯与剑》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著作。首先，它的书名就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动。圣杯，在古代欧洲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它是人类的生命之门，它创造和

孕育着生命，我们正是从它那里吮吸生命之水；而剑，在印欧地区，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它是暴力、杀戮和抢劫的象征，它毁灭和夺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它面前战栗发抖。艾斯勒认为，圣杯是人类社会伙伴关系的组织模式的象征，而剑则是统治关系的组织模式的象征。因此，她从一种崭新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这种观点是：关于人类文化的双稳态的动力理论。她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互相竞争的吸引子：伙伴关系（或男女合作）的模式；统治关系（男性中心）的模式。她用大量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历史上男女合作的文化主要是爱好和平的，而男性中心的文化的特征则是战争，因此，它们可以分别以圣杯和剑来象征。

其次，《圣杯和剑》一书也是大胆地用一般进化论理论研究人类社会的开创性的著作。从非线性动力学的观点（包括灾变论、分叉论和混沌理论）来看，该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新历史理论的源泉，这种理论的基础是综合动力学的概念。它扩充了素罗金、汤因比和其他社会学家所阐述的早期的那种简单的模式，它强调社会转化（或分叉）；而不是周期性出现的平衡，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的动力学特点。它还进一步发展了托姆、泽曼、波斯敦和雷福洛关于历史发展的灾变模式的理论，它不仅为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且为调节文化进化提供了基础。

当然，艾斯勒把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所取得的成果是否正确，还是值得争论的，但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而批判其错误的观点。

我的学兄闵家胤和艾斯勒女士很熟，正是他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并且联系了出版社。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将本书全部译完。在翻译的过程中，闵家胤先生和俞天民先生通读了全书，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本书责任编辑罗琳女士为本书的可读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所提出的大量修改意见，译者尽可能都加以采纳了。

本书中文版前言、导论是在俞天民先生和朱枚女士译稿基础上重新译过的。

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文虽然下了功夫，但不当之处，甚至错误一定还有，尚希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程志民

1991年11月2日

致 谢

XI

本书是以多种方式所作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利用了无数男女的著作和观点，对于他（她）们中的许多人，作者已经在注解中表示了谢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人在编辑、手稿准备方面给予作者的批评、建议和帮助，尤其是过去 10 多年来给予作者的支持和鼓励，都是无法估价的。

戴维·洛耶——本书就是献给他的——对于本书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我无法恰如其分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位非凡的人多年来的全心全意和积极的合作，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他常常放下自己重要的工作，慷慨无私地以超人的耐心奉献出他的学识、思想、编辑技巧和理解。

许多妇女对本书给予了慷慨的帮助。我特别要向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内特·爱莉茜表示衷心的感谢。作为一位心理学教授和科学编辑顾问，她撇下自己繁忙的日常工作几次阅读了最后形成本书的大量的手稿。她在校阅本书时所提出的坦率的批评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对于我偶尔松懈的精神和力量是一种巨大的帮助。我还要对卡罗尔·安德森、弗兰·霍斯肯、马拉·凯勒、丽贝卡·麦卡恩、艾索林娜·里奇和不久前去世的威尔玛·司各特·海德表示衷心的感谢。她们每位都阅读了本书不同阶段的手稿的全部或大部分，并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慷慨无私地奉献了她们的支持和爱。《圣杯与剑》和我还要对阿什利·蒙塔古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他没有去完成自己的两本书而是逐字逐句和每个注解地审阅了本书。这样一位为了改善人类的处境而奉献了自己漫长而

XI

非凡的创造性生命的大部分时光的人，对我的书所表示的信心对我来说乃是一种巨大的帮助和鼓舞。

我还应该开列另一张名单才能恰如其分地感谢以重要的方式对本书作出贡献的每一个人：我的女儿安德芮和洛伦·艾斯勒，我的代理人埃伦·莱文，我的编辑简·约翰逊，以及哈泼与罗出版社的其他许多编辑，他们是：克莱敦·卡尔森、汤姆·多萨尼奥、迈克·基霍、伊冯·基欧、多里安·高希和弗吉尼亚·里奇，以及在本书最后创作阶段热心关注本书的所有其他的人。

从他们各自学科的角度阅读了作为一本正在创作过程中的《圣杯与剑》的部分手稿并作出贡献的那些人中有：考古学家玛丽亚·吉姆巴塔斯和尼古拉斯·普拉东；社会学家杰西·伯纳德和琼·罗克韦尔；精神病学家琼·贝克·米勒；文化和艺术史家埃莉诺·盖登和默林·斯通；比较文学家格洛丽亚·奥伦斯坦；生物学家维尔莫斯·萨尼；“混沌”和“自组织系统”理论家欧文·拉兹洛和拉尔夫·亚伯拉罕；物理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未来学家黑兹尔·亨德逊和罗伯特·琼克；以及神学家卡罗尔·克赖斯特。阅读部分手稿或提供重要建议、信息、鼓励和支持的其他人有：（按字母顺序排列）安德拉·埃克斯、莱蒂·贝内特、安娜·比尼库斯、琼·布林德尔、玛丽·坎特龙、奥尔加·艾莱夫斯里亚得斯、朱莉娅·艾斯勒、梅尔·格雷夫、玛丽·哈迪、海伦·赫尔默、爱莉·希克森、伊丽莎白·霍尔姆、巴巴拉·霍尼格、阿尔·伊柯夫、埃德·贾维斯、阿比达·卡纽姆、萨姆森·诺尔、帕特·莱拉、苏珊·梅拉、玛丽和劳埃德·莫雷恩、希尔卡·彼蒂拉和柯塞特·汤姆森。名单很长，但篇幅有限，我在这里不可能提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因此，如果这里遗漏了谁的名字，我向他诚挚地道歉，因为我希望指名道姓地感谢在多年的研究和写作中不仅给我思想上的鼓励而且给我以情感上的支持的所有的人。

我的确应该特别感谢那些参与似乎没完没了的手稿准备工作

的人，尤其是：珍妮·亚当斯、瑞安·邦兹、基德龙·布赖森、凯西·坎贝尔、西尔维亚·埃德格伦、伊丽莎白·多尔马特、黛安娜、伊丽莎白·哈林顿、彻里·朗、珍妮·麦格雷戈、迈克·罗森堡、辛迪·斯普拉格、苏姗娜·夏维奥纳、伊丽莎白·瓦伯和约·沃利。

导论：圣杯与剑

XI

这本书打开了一扇门。很多人和很多书都铸造了这扇门的钥匙，而且还需要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书来彻底探索门后的广阔前景。但是，即便把这扇门打开一条缝，也能揭示令人神往的关于我们过去的新知识——以及关于我们潜在的未来的新观点。

对我来说，毕生的追求就是探寻这扇门。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考虑问题时处处都不相同。现在也是这样。我很小就产生了一种极度关心人类处境的热情。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所知道的外表安全的世界由于纳粹占领奥地利而被打得粉碎。我亲眼看着我的父亲被抓走，在我母亲奇迹般地把父亲从盖世太保手中救出之后，我父母和我为活命而出逃。我们乘飞机到了古巴，最后到了美国。我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真理。我也开始思考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并不是，而且绝不是抽象难懂的。

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和迫害呢？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以及对妇女的令人憎恶的残忍行为呢？人类怎么能对他们自己的同类如此野蛮残酷呢？什么东西使我们顽固地倾向残忍而不是友善，倾向战争而不是和平，倾向破坏而不是建设呢？

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中，只有我们能够耕种土地，收获果实，创作诗歌和音乐，寻求真理和正义，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或者也教孩子们欢笑和哭泣。因为我们具有想象新的现实并通过日益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这些新现实的独一无二的的能力，所以在我们自身的进化中，我们确实是伙伴。但是，我们这个奇妙的 XIV